

当代上海党史文库

艰 难 探 索

1956—1965

主编 徐建刚

第二册

上海书店出版社

目 录

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在上海的贯彻·····	严爱云(291)
上海的三次工业大改组·····	徐建刚(314)
《工业七十条》在上海的贯彻·····	沈逸静(337)
《农业发展纲要》和《农业六十条》 在上海的贯彻·····	潘文彬(362)
《商业四十条》在上海的贯彻执行·····	刘梅珍(377)
上海发展尖端科技和高精尖产品方针的提出与 贯彻·····	吴英熙(394)
《高教六十条》在上海的实施·····	郑 挺(417)
上海的国防三线建设·····	张永斌(432)
经济调整时期上海职工的支农活动·····	张金平(445)
上海知识青年的垦荒支边活动·····	吉景峰(460)
上海工业学大庆运动·····	沈逸静(472)
上海市郊的农业学大寨运动·····	任晓伟(484)
南京路上好八连·····	征华成 赵永杰(503)
上海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张 辰(528)
上海的反右倾斗争·····	李 军(554)

上海农村的“四清”运动·····	任晓伟 潘文彬(565)
后记·····	(573)

国民经济调整方针在上海的贯彻

严爱云

从 1958 年起历时三年的“大跃进”运动和几乎同时掀起的人民公社化运动,由于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造成始料不及的恶果;加之农业连年遭受自然灾害,使我国国民经济发生了严重困难。60 年代初期,为了克服困难局面,中共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通称“八字方针”。从 1961 年起,上海国民经济也同全国一样进入贯彻八字方针的调整时期。

一、国民经济调整前上海的困境

在八字方针提出前,上海的经济形势已十分严峻。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某些工作要求过急等问题,在上海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大跃进”中,上海重工业在大量的投资下产量虽然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成倍的增长,但同时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的严重失调,在 1958~1960 年三年中,上海重工业年均投资额达到 6.44 亿元,而轻工业仅为 0.44 亿元。由于重工业的高速发展,导致积累与消费、工业与农业、工业与商业、工业与市政等方面的比例失调状况极为严重。从 1958~1960 年三年间,上海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共达 34.28 亿元,其中生产性投资额

高达 28.75 亿元,占投资总额的 84%,而非生产性的诸如市政、园林、环卫、教育、科研、文化、医疗等方面的投资仅占 16%。在生产性投资中,工业投资占生产性投资总额的 76%,高达 21.96 亿元(其中重工业投资额达 19.32 亿元,占工业投资总额的 88%;轻工业仅占工业投资总额的 12%),而其他生产性投资如农业、商业、交通、邮电等方面仅占生产性投资总额的 24%。而且由于非生产性建设被放在次要地位,往往排队在后,削减在前。市政公用设施等事业,如道路、自来水、煤气等设施,不仅为人民生活提供服务,也为生产发展提供条件,得不到必需的投资,造成许多公共事业旧账未还又欠新账,城市建设“骨肉”比例严重失调,还导致了上海市区交通拥挤、住房紧张、人民生活条件较差的不良局面。

在“大跃进”思想影响下,违背科学规律急于求成、忽视管理现象也很普遍,浪费严重,造成产品质量下降,生产成本上升,如上海冶金企业,钢和成品钢材的产量大幅度提高,经济效益却急剧下降,在 1959~1961 年这三年中共亏损 3.45 亿元。在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过程中,不恰当地扩大社有经济,搞“一平二调”的平均主义,在分配上过多地扩大了供给制部分,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更为严重的是,1959 年初城市副食品和日用品就已呈现匮乏状态,到了 1960 年上半年,人民的基本口粮也出现了问题。1960 年下半年,上海已经发生大米没有库存、天天向中央告急的情况,中央不得不对上海以及其他缺粮的京津辽紧急调运粮食。然而征粮工作难有起色。一面是农村遇到了严重的春旱和洪涝,粮食减产;另一面却是国家公粮需求征购增加,这样更多的饥荒人口出现了。大量饥民从农村外流,对城市构成新的压力。中共中央于 9 月 7 日发出《关于压低农村和城市的口粮标准的指示》,据此城市人口除了高温、高压、井下和重体力劳动者之外,平均每人每月粮食供应标准要减少 2 斤。上海市一般居民的每月粮食定量在 21~28 斤之间。粮荒也影响到副食品的短缺。上海郊县的农田争

相种粮,其他经济作物无以立足。不但人没有蔬菜吃,禽畜也没了青草吃。粮、油、布、肉、禽、蛋的商品供应量大幅度减少,市场上猪肉供应寥寥。每人供应定量一月仅猪肉 2 两。人民生活水平下降,不少市民、职工因缺乏必需的营养得了浮肿病,不少人感染了肝炎。尤为紧迫的是,由于全国农业减产,轻纺工业的农产品原料短缺,煤、电供不应求,使上海的许多工厂生产困难。据统计,1961 年初,上海有三分之一的工厂企业被迫停工,另有三分之一工厂企业处于半停工状态。

但是,在当时形势下,中共上海市委对经济调整方针的认识也同中央一样,有个曲折、反复的过程。1961 年 2 月 9 日至 12 日,市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精神。会上工业系统为缺煤、缺电、缺原材料而着急,农业系统为农业生产发愁,大家都总结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的教训。然而干部中仍普遍存在既要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又舍不得“跃进”,而且还要争取主要产品的产量比上年有较大增长的思想。因此,这次市委扩大会议仍提出工业生产力争不低于上年水平的目标,对农业生产也确定了一系列不切实际的高指标。到了 1961 年 6、7 月间,中共上海市委召开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简称《农业六十条》)的全市农村三级干部会议。面对粮食日趋紧张,市区居民、职工定量减少,猪肉已经没有库存、市区停止供应的情况,开始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会后,市委又制订了《关于贯彻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的若干补充规定(修正草案)》,以及《关于积极鼓励和帮助私人养猪的通知》,着手对农村的调整工作。这一年,上海工业系统虽然根据中央指示做了些调整工作,采取后退的措施,但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困难局面。

1962 年 1 月 11 日至 2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有中央、省、地、县委书记,重要厂矿企业和人民解放军各部门负责同志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著名的“七千人大会”,目的是为了

进一步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切实做好国民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之后,党中央用七千人大会精神统一全党认识,调整工作才真正开始扎实推进。上海各项工作也全面进入调整。1962年5月,中共中央召开工作会议,进一步制定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措施,要求对国民经济进行坚决的全面调整。从5月起,全国上下根据周恩来“先抓吃穿用,实现农轻重,搞好综合平衡”,以及陈云关于国民经济调整要退够和克服困难的六点意见,进行全面调整。

根据中央有关精神,1962年7月18日,在上海市第四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副市长曹荻秋代表中共上海市委、市人委所作的《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工作报告》中指出,上海依据八字方针,确定了“缩短重工业战线,压缩基本建设规模,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加强轻工业战线,积极支援农业生产,保障市场稳定,并在商业、文化教育等方面,相应地进行调整”的具体方针。同年10月,市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当前工作的要点》,进一步统一认识,提出了以生产为中心,做好调整工作的决定。此后,影响到全市各行各业的调整措施加快出台。

二、八字方针的贯彻

上海贯彻八字方针的五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1961年至1962年底是后退、整顿阶段。在这一阶段的调整过程中,中共上海市委以七千人大会精神统一上海全体共产党员和广大干部的思想,逐步实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调整措施,历时两年走出了经济发展低谷。随后的1963年至1965年是恢复、发展阶段。根据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按照解决吃穿用、加强基础工业、兼顾国防的要求,继续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工作。1963年底召开的市第三届党代会提出依靠上海科学技术力量向

“高、精、尖”发展的方针,为上海的经济调整赋予了新的内容。

上海对八字方针的贯彻,主要从以下几方面展开:

(一) 调整工业

针对“大跃进”中工业内部比例严重失调,以及工业与其他各业严重不平衡的状况,上海采取果断措施调整工业,并且在调整过程中致力于合理的发展。

1. 降低工业生产指标,压缩重工业,发展轻工业

由于“大跃进”中上海工业生产指标过高,工业内部比例不合理,上海在调整中首先降低过高的工业生产指标。其下降情况从五年调整期间的上海工业生产总产值降升中可见分晓:1961年全市工业总产值由1960年310.17亿元骤降到189.95亿元,降幅为38.8%;1962年降至150.23亿元,继续比上年下降20个百分点。此后略有回升,1963年为169.65亿元。到了1964年、1965年,在国民经济比例关系开始趋向协调的基础上,全市工业总产值回升速度加快。其中1964年为203.51亿元,及至1965年,工业总产值已增至252.04亿元,但与1960年相比,仍下降18.7%。当然,这几年与1960年相比,工业发展速度虽然放慢了,但含有的“水分”较少,经济效益较好。1961年上海地方工业中有114户亏损企业,到1963年减少为37户,亏损金额由3.1亿多元降至154万元。以冶金工业为例,全行业1959年开始亏损,1962年起即扭亏为盈,在调整中上交利润逐年增长。

压缩重工业主要是压缩钢铁、机械、建筑材料等工业部门过高的生产指标。全市钢铁业几年中先后停闭了上钢二厂、上钢六厂、机修总厂、华丰钢铁厂等4个工厂的3个转炉车间及上钢一厂、上钢三厂的1个转炉车间,精简职工3.6万人。全市钢产量从1960年的251.9万吨降为1961年的165万吨,1962年再降为120.8万吨,两年降幅达52.1%。到1965年才回复到1960年的水平。

机械工业降幅更大,1960 年总产值为 128.5 亿元,1961 年降至 61.1 亿元,1962 年降为 35.7 亿元,两年降幅达 72.2%。1965 年回复到 62.5 亿元,仍比 1960 年下降 51.4%。机电工业共关、停、并、转 118 家企业,精简职工 6 万余人。建材工业的总产值从 1961 年起逐年下降,两年后虽有回升,到 1965 年,其总产值 5.2 亿元仍比 1960 年的 7.58 亿元减少 49.3%。上述 3 个重工业部门的调整,带动了全市整个重工业总产值的下降,从 1960 年的 174.7 亿元降至 1962 年的 60.8 亿元,到 1965 年回升到 109.4 亿元,仍低于 1960 年的水平。重工业在工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 1960 年的 56.3%下降到 1962 年的 40.5%。在调整重工业过程中,注意分别情况区别对待,既压缩过高的生产指标,改变一些企业的生产方向;又为发展农业和加强轻纺工业服务,更多地增加农业机械、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产量。

在“大跃进”中,因为片面突出重工业,影响了轻纺工业。上海在经济调整中把发展轻纺工业、增加人民生活必需品的生产放到重要位置。由于国家财政困难,对轻纺工业的基建投资也大幅度下降,加上农业减产导致原料供应困难,发展轻纺主要依靠挖掘原有企业潜力。上海通过促使在“大跃进”中改建、扩建和新建的 170 多个轻纺工厂或车间先后建成投产,以增加产量,并填补了照相机、胶片、手表、合成洗衣粉、合成脂肪酸、光学玻璃、铌粒等空白工业部门,还增加了人造革、日用塑料制品的生产能力。上海还大力发展化纤和人造纤维等替代品以补原材料的不足。1962 年,人造纤维的生产能力达到 5 780 吨,相当于 12 万担棉花。到 1964 年,上海已有 4 个化纤原料厂和 8 个化纤抽丝厂或车间建成投产。上海还在提高产品质量上下功夫。在当时考核的 117 种主要轻工产品中全面达到质量标准的一类产品由 1961 年的 43.6%提高到 1965 年的 94.6%。

2. 实行第三次工业大改组,调整工业结构和产品结构

为贯彻国民经济调整八字方针，上海进行了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三次工业大改组，力图通过改组促进工业内部比例关系的调整，使上海工业能协调发展，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新兴工业的较快发展。在改组中，对重工业中一部分生产任务不足、原材料供应无保证、设备陈旧落后、产品质量差的工厂实行了关、停、并、转。1962年8月和1963年1月，上海分两批关、停、并、转了623家工厂，占1961年全市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总户数的15%左右，对上海国民经济的调整起到了积极作用。同时注意保持上海工业面向全国、多样性、灵活性的特点，为以后发展保存实力。全国独特的产品即使生产任务严重不足，也予以保留。如亚洲电机厂是全国唯一生产洗衣机的一个点，1962年该厂生产任务只及生产能力的20%左右，但仍然保留了这家工厂。再如上海电梯厂，年生产能力120台，1962年全年任务只有3台，但全国只有两个点，为今后发展需要，也保留了下来。

第三次工业改组还改变了某些工业部门的生产方向和产品结构，压缩了部分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的生产。经过几年的调整，上海的工业企业数从1960年的13 488个减少到1965年的8 189个，其中大中型企业从234个增加到404个，占工业企业数总数的4.9%。职工人数从1960年的285.95万人下降到1965年的272.13万人。市区街道工业由7 500余户收缩至3 800余户（包括里弄生产组3 500余户），从业人员由40万余人减少到近12万人（其中里弄生产组8.8万人），减幅达三分之二以上，并统一隶属关系，全部划归手工业管理部门领导。此外还调整了这些单位的生产方向，除继续保持其为大工业协作加工和服务的生产任务外，逐步引导转产市场需要的小商品，并按行业组织一条龙安排生产，使大部分街道工厂的生产直接或间接地纳入各级生产计划。

3. 调整中结合向“高、精、尖”方向发展

上海在贯彻八字方针过程中，既着力于调整，又致力于发展提

高。在经济调整中,针对上海在生产技术、产品品种和质量方面同发达国家相比总体上处于全面落后状态、同兄弟省市相比既有领先也有落后这样“两个落后”,上海提出了赶超国内先进、国际先进的“两个赶超”口号,把工业依靠科学技术来发展高级、精密、尖端产品作为贯彻八字方针的一个重要内容,从而使上海的工业生产能力、技术水平更上了一层楼。

1962年起,上海有组织、有计划、有重点地对工业进行大规模的技术改造。到1963年底,上海工业的基础有了很大增强,生产技术水平进一步提高,特别是在品种和质量方面有了新发展。12月下旬,上海市委在市第三届党代会上总结上海结合贯彻“充分利用,合理发展”工业方针来搞好经济调整的经验,认为上海作为我国重要工业基地,技术基础强,协作条件好,工人技术水平高,具有适应性、灵活性、多样性的特点,充分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必须根据国家建设的需要和上海现有条件出发,有计划地对上海工业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组,进行适当的改建和扩建,建立一些必要的骨干企业,加强某些薄弱环节,这样,就可以使上海工业在合理发展的基础上得到充分利用”,以更好地支援全国建设。这一指导思想在调整中得以贯彻,因而上海在调整中并不是消极的压缩,而是积极的治理整顿,做到“下中有上”,“退中有进”,即在治理中求合理,整顿中求发展,成为产业技术组织、产品优化组合的契机。这次会议还确定了“把上海建设成为我国一个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的目标,再次强调依靠上海科学技术力量向“高、精、尖”发展的方针,赋予了上海经济调整以新的内容。随后,全市贯彻党代会决议,确定以发展新材料、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为中心,重点发展6个重点新兴工业和18项重大新技术。这些决策,对上海经济由调整实现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上海在贯彻“八字方针”向“高、精、尖”发展过程中,把老企业的技术改造放到突出地位。1962年开始有计划地进行企业技术

改造。主要是结合行业改组,对占总数一半以上、使用年限超过20年的设备逐步进行更新和改造,填补缺口,增添高精度技术装备。对于那些虽已陈旧、而在工艺上基本能够保证加工质量、只是效率差一些的设备,通过对主要零部件的革新或改善一部分结构,以提高其性能,从而达到投资省、收效快的效果。对于有些专用的或精密的设备,尽可能自行设计制造。据1964年初统计,机电、仪表、化工、纺织5个工业局系统的16万台专用设备,有一半是自行制造。对于部分生产急需、技术要求较高、本单位制造有困难的设备,就组织全市科研、设计单位和大专院校协作攻关。为了把科研、试制、配套、推广应用等方面系统地组织起来,市委、市人委主要领导把市计委、科委、生产委员会协调起来,成立指挥部。仅1965年全市实现的技术革新项目就达14.2万项,其中具有普遍推广意义的有1万项,在改进设备、工艺模具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效果。在提高生产第一线产品质量和增加产品品种的过程中,上海还注重改造和加强技术后方。1962年全市工业技术改造规划共305项,投资为4500余万元,其中属于技术后方的有52项,投资为1154万元。1963年全市技术改造规划项目有240项,投资为8000万元,其中属于技术后方的有42项,投资为1537万元。由于在赶超国际先进水平活动中对技术改造作出了巨大努力,因而使上海的工业技术装备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二) 调整基本建设

“大跃进”中进行的大规模基本建设,超过了国家和地方财力、物力的承受能力。基建投资的增长过快和投资分配比例的不当也是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的重要原因之一。上海在贯彻八字方针中,对基本建设进行了压缩调整。

1. 压缩基建投资

“大跃进”三年上海的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上海国民经济恢复

时期和“一五”计划时期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 2.2 倍。在经济调整中,上海大幅度削减基本建设资金的投入,1961 年全市基建投资总额降至 4.91 亿元,比 1960 年 12.23 亿元的投资总额减少了约 60%。1962 年进一步下降到 2.19 亿元。此后略有回升,到 1965 年达 5.12 亿元,仍比 1960 年下降 58.1%。在五年经济调整中,上海基本建设投资累计总额只及三年“大跃进”投资总额的 60% 左右。

2. 协调基建投资比例

为了扭转“大跃进”中生产性基建尤其是重工业基建投资过多的不合理状况,上海在实行经济调整的五年中,调整了基建投资的分配比例,按农轻重适当安排,使农、轻投资比重逐渐上升,重工业投资比重有所下降。并注意到兼顾非生产性建设投资,试图协调城市建设中“骨头”与“肉”的关系。到 1965 年,生产性建设投资比例降至 76.2%,非生产性建设投资上升到 23.8%。在工农业的基建投资中,重工业所占比例降为 75.7%,主要用于填平补齐和续建扫尾项目,轻工业比例上升到 19.8%,农业的比例上升到 4.5%。但是由于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中仍受“左”的影响,生产性建设投资下降和非生产性建设投资上升的幅度并不大,轻纺工业及市政公用设施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未能获得根本解决,不少矛盾继续留存下来。

3. 提高基建投资效益

在经济调整中,重视了基本建设投资效益,对占当时建成项目总投资 8% 的 208 个不能正常投产和使用的项目,采取区别对待的办法,解决部分建设项目“缺胳膊少腿”的问题,使其尽快形成生产能力,发挥投资效益。同时利用部分旧厂改建、扩建、挖潜,增加生产能力。当时发展较快的手表、感光胶片、人造纤维等行业,就是利用其他工厂多余的厂房加以适当改建而发展起来的。从 1961 年到 1965 年,上海全市改建和扩建的比例占基建投资总额的 68.3%。可以说上海在这个时期增加的工业生产能力,主要是通过

挖掘原有厂房设备的潜力,并加以适当改建和扩建来实现的,收到了很好的经济调整效果。

4. 城市建设的调整

“大跃进”中,上海城市建设投资达14 423万元,比“一五”期间还多114.7%。但主要用于卫星城镇和市郊工业区的建设,忽视了市区建设,产生了不良后果。在经济调整中,上海在有限的投资中,针对城市建设中的薄弱环节加以改善。如针对上海市区地面沉降与积水严重的问题,加强了防洪、防汛设施。市政建设的维修和保养方面,这一时期对重点道路进行了改造,其中有南京路拆除有轨电车轨道,改行无轨电车;翻修西藏路;整修延安路;拓宽控江路、大连路、天目路等。另外,还改造、新建学校校舍,仅1963年拨出的有关投资就相当于“二五”期间计划中小学建设投资的46%。

(三) 整顿农村人民公社

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上海贯彻中央有关精神,对郊区人民公社普遍进行了以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为主要内容的整顿。

首先,改革分配等制度,纠正农村中的“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上海组织郊区各县人民公社的各级干部认真学习中共中央有关文件,分清正确与错误的界限。逐步废除了“吃饭不要钱”的供给制,陆续恢复“三包一奖”(包工、包产、包成本、超产奖励)的分配制度,处理了个别错误严重、违法乱纪的干部。1961年6月起,对于农村人民公社无偿调用的集体财产和侵占社员个人的生活资料,进行清理退赔。继续借用的办理正式借用手续并付给租金,使集体和社员个人不受损失。通过上述措施,使农村中“五风”逐步得到纠正,调动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

其次,降低公有化程度,实行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制度。上海郊区在人民公社化的浪潮中,一直以生产大队为核算单

位,不论生产队收入高低都被拉平,这就使低产队的社员产生依赖性,而收入高的生产队的社员经济收入减少,积极性受到严重挫伤。到1962年底,上海郊区各县将基本核算单位由生产大队改为生产队的有2913个,占大队总数的98.7%。划小了核算单位,不仅有利于克服平均主义和瞎指挥,还保障了生产队的生产自主权,使社员“看得到、摸得着”,增强了生产队干部、社员的责任心。在划小核算单位的同时,还缩小了人民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的规模,公社数从172个增加为198个,生产大队从2677个增加到2951个,生产队数从20157个增加到29170个,每个生产队平均为31户农户。

再次,恢复社员家庭副业、自留地和农村集市贸易。自1959年下半年起,上海贯彻郑州会议精神,逐渐恢复郊区农村社员家庭副业。反右倾后有过反复。在经济调整中,随着进一步落实农村各项经济政策,特别是陆续发还社员自留地后,家庭副业经营更趋兴旺。到1962年,全郊区农村社员共分得自留地36万亩,占上海郊区耕地面积的比例从原来的3%~5%提高到7%。社员自留地种植的发展带动了社员私人养殖业的发展。农村集市贸易随之相应增多,活跃了城乡市场。国家还调整了农业税以减轻农民负担。市郊农村通过贯彻党的各项政策,生产条件有了改善。

(四) 调整商业

在贯彻八字方针期间,中共上海市委和市人委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改进商业工作的多次指示,并按照196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改进商业工作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和1962年9月中共八届十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的精神,对上海商业采取了有力的整顿和改进措施。

1. 调整商业经营管理,改善工商、农商关系

上海在经济调整中,在商业经营管理方面进行了一系列调整,

以大力改善市场供应。一是重建供销合作社,把已经同国营商业合并起来的供销社再分开,恢复原来的集体所有制性质,退还其积累和社员股金。二是调整零售商业、饮食服务业网点的布局,恢复了一些专业特色店和特色商品,还恢复了“前店后场”的经营方式。三是恢复了货郎担和流动饮食摊,并开设日夜商店,发扬过去好的服务传统,方便市民夜间购货。商业体制经过调整,恢复了传统经营服务特色。在商业内部恢复和建立了各项基础管理制度,还规定凡有条件的商业企业都实行单独核算,没条件者推行简易核算,零售商店实行柜组核算。通过调整,全市商业企业普遍增加了盈利,有些亏损企业扭亏为赢。

上海还组织商业部门进行市场调查,引导工业部门的生产。上海商业部门于1963年派出450多人分赴24个省、市的512个县调查市场情况,及时将信息反馈给工业部门,以增产市场需要的轻纺工业品。针对商品严重匮乏情况,还多方组织商品货源,由商业部门派出大批采购人员,深入苏、浙、皖、赣、湘、豫、鄂、内蒙古以及东北地区等14个省、自治区进行采购。上海市委领导和商业部门也深入全国产粮省市,积极采购粮食。据统计,上海1960~1962年三年中,共从外地调入粮食422.15万吨,在全国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维持了1957~1959年的水平,使整个困难时期,上海没有出现严重到使人致死的饥荒。同时,注重改进工商、农商之间的购销关系,根据商品的不同特点,分别采取商业包销、商业选购和工业自销等形式。对于日用工业品中的小商品,由于品种繁多,需求多变,采取由工业部门自销或先由商业部门选购的办法。据1964年初对上海各个商业一级采购供应站的调查,在收购的日用工业品中,适销对路的商品比重已经提高到95%左右。在改进农商关系方面,上海商业部门主要是处理好工业品下乡和农副产品进城这两个问题。对于农民购买有些供不应求的工业品,主要实行综合换购的办法,就是按照农民出售农副产品的品种、数

量或金额,发给农民一定数量的购买工业品的票证;对于农民向商业部门出售统购派购的农副产品,则奖售给农民化肥、饲料等。在经济调整时期,上海还调整了对郊区农副产品的购留比例和收购价格,使农商关系得到改善。

2. 恢复供销合作社,开放集市贸易,活跃城乡物资交流

从1960年起上海在各郊县开放集市贸易。1961年1月上海市委发出《关于活跃市区集市贸易的几项通知》,随后市区开放了16处农副产品集市,同年4月又因故予以关闭。由于市区农副产品集市适应了农村经济好转和城市人民对农副产品的需求,因此事实上难以取缔。上海从1961年下半年开始逐步恢复供销合作社,把已经同国营商业合并起来的供销社再分开,恢复原来的集体所有制性质,在郊区设180多个基层社,推动工业品下乡;在市区设立4个经营处和100多个门市部。通过供销社自营业务的发展,协助国营商业活跃城乡物资交流,改善市场供应。开放农村集市贸易点239处,市区边缘地段农副产品自由市场43处,市区摊贩约有9万人,当年城市集市贸易成交额达4000万元。开放集贸市场不仅促进了农副业生产的发展,还增加了商品的供应,补充了计划市场的不足,使商品流通渠道畅通,物资交流趋向活跃。因“左”的政策影响,对集市贸易的管理偏紧,倾向限制其发展,到1965年,贸易额只有200万,仅及1962年贸易额的5%。随着个体经济的恢复,仅1962年,从国营企业调整出来的小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就有1.1万多人,恢复个体商贩、私营小店9800多个,到1965年,个体商贩、私营小店总数达9800户,比1958年增加了近2倍。

3. 建立副食品基地,保障商品供应

针对市民蔬菜、副食品供应匮乏的困境,上海市政府千方百计加以弥补。从1960年起,市委、市人委年年抓蔬菜生产,保证市区的蔬菜供应。1957年上海郊区菜田面积为19.5万亩,1960年供